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三

# 战时中国的 社会与文化

杨天石 黄道炫 编

社会史、文化史是近年来国际史学界的热门学科。《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本计划的第三个专题。参加者有中国大陆的暴兵、高华、黄道炫、汪朝光、江旸、金以林及台湾的张建伟、洪秋芬、日本的土田哲夫、内田知行、伊藤俊哉、美国的何福德、索菲亚·李等。他们分别考察了战时中国的教育、社会动员、电影、民间交流、难民、保甲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三 ·

# 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杨天石 黄道炫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杨天石, 黄道炫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三)

ISBN 978 - 7 - 5097 - 0631 - 2

I. 战... II. ①杨... ②黄... III. 日本 - 侵华 -  
历史 - 文集 IV. K265. 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278 号

·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三 ·

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编 者 / 杨天石 黄道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徐巧燕 薛 义

责任校对 / 高 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7 字数 / 285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631 - 2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一

傅高义 (Ezra F. Vogel) \*

(罗敏 译)

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德国与其邻国波兰、法国等之间的商贸往来发展得很快。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来自各国的政治

---

\* 作者：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家们开始相互协商，相互理解，克服数个世纪的战争阴影，开始了漫长的和解过程。尽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问题依然存在，欧洲已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亚洲，由于中国的内战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使得“二战”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讨论历史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1945~1952年，日本被盟军占领，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占领期间，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与中共领导人有密切接触。1952年，日本结束被占领后，冷战又阻止了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有相当一段时期中日领导人之间没有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开始和解，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间和解开始于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但是由于在1972年两国迅速建交，两个民族没有机会在邦交正常化之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努力想实现两个民族间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日间新问题的出现，和解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中日之间的隔膜已成为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的、最长期的障碍。中日两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需要共同协作，不仅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积极地解决环境、能源短缺问题和防治传染病等。要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特别是历史记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理性寻求两国间共同利益的最根本的障碍。中日间问题的解决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日间的文化差异、历史记忆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亚洲地区将不会有真正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二战”前出生的一代学人，我是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既对中国又对日本感兴趣的学者之一。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此我尝试去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我是研究当代社会的，

自1958年首次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我便开始频繁地接触日本人。1961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当时中美关系不是很密切，我没有机会前往中国开展调查。因此我不得不从外部开展研究工作。但是自1973年参加美国访华代表团和1980年在中山大学访学两个月后，我开始同中国人建立起个人间的友好关系。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文化深怀敬意，在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友人。自1958年以来，我至少每年访问日本一次；自1980年以来，我开始至少每年访问中国一次。

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日两国的国内社会，但是由于接替费正清先生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负责哈佛大学的美日计划，并创立了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越来越对改善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逐渐地转向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1993~1995年，我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有关东亚方面智囊机构的官员。1996年我负责领导汇编“与中国共存”的研究计划。1997年，我非常荣幸地负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到哈佛大学访问。

2000年，我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尽量帮助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亚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邓小平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于是我选定这一研究方向，其目的是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作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与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中日两国间的深层症结在中日战争，因为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我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和解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但我相信，如果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对各自的歧异

均能有清楚的、客观的了解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各方学者均能认同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那些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和解以便进一步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政治领袖们，便会根据学者们的成果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遇到了一批持有相同学术理念的杰出学者。他们都认识到客观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一些敏感议题开展共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对那些对中日相互和解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想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而言，这种学者间跨国界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有关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材料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没有方便地为学者所利用。一国学者所熟知的史料，另一国的学者则知之甚少。为了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相关专题，让不同国家的学者互相了解对方的史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而搭架桥梁。

在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杨天石先生负责召集中国方面的优秀学者来研究 1937 ~ 1945 年的中日战争。在日本，由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两位先生为主要召集人，并由卫藤沈吉先生提供协助，负责召集日本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我不是研究中日战争的专家，我只是为研究中日战争的西方学者作一些学术上的组织与协调工作。我所召集的西方学者有：戴安娜女士、麦金农先生和 Mark Peattie 先生。

组织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召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研讨会，需要那些相信有必要对敏感问题开展共同研究的多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来自中国 and 日本的学者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本国的爱国者的攻击。这些爱国者认为战争的历史是政治议题，并非历史问题。

这种跨国共同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远非一

般学术会议可比，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我们必须翻译所有的与会论文，并拥有同声翻译。来自各国的学者虽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对会议的安排均非常配合。

筹备会议于2000年在东京召开，次年我们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夏威夷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军事战役。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我们希望第四次会议能在中国召开。

为了让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决定让来自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组织者分别整理并出版各自的论文集。会后，各国学者都认真修订或重新改写了论文。英文版的第一卷论文集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由麦金农、戴安娜和傅高义负责编辑。第二卷也很快要出版，由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和 Hans Van derven 负责编辑。前两卷的日文版也已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们希望这些论文集的出版将会增加大家对各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吸收、借鉴。



## 序 二

杨天石\*

战争是个大怪物，可怕的怪物。它毁灭生命、财产，制造不幸、灾难、悲剧，吞噬、毁灭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之间进行过的战争已难以数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难以数计。以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战争中，中国平民伤亡312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余万人。如以1937年的美元计，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余亿美元。这样的战争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自然可以避免，中国国家的面貌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自然，战争多种多样，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例如，一个国家为统治、奴役另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侵略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又如，压迫者、剥削者为维护一己私利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为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生存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两种战争性质不同，不可以一概反对。当被侵略者、被压迫者、

---

\*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被剥削者不得已而选择战争这一形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理当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同情。这是战争史的基本常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不分是非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是错误的，绝不可取的。

然而，战争毕竟是一种无比巨大的破坏力量，能够避免要尽量避免。如果人类能够有其他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么，还是不用战争这种形式为好。中国古代的圣人老子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后来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曾经根据老子的思想，加以发挥，写过一首题为《战城南》的诗，描写一场鏖战后的战场惨景。诗云：“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中国人民自古就热爱和平，但是，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对战争，其原则是“不得已而用之”。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消灭战争。毛泽东，这是一个大半生南征北伐，靠战争打下江山的历史巨人。他当然深知战争的功用，但是，他也深知战争的残酷，主张消灭战争。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

消灭战争，就要研究战争。从2000年起，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即联络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20世纪的中日战争（1937~1945）。这是一场对中国、对亚洲、对美国，也对日本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记住它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共同保卫和平。我很赞同傅高义教授的这一想法，积极参与其事。记得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时，论题是“战时中国的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东西方的学者围坐一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各抒己见。特别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会议的中日两国的学者各有十余人，虽然有争论，但气氛融洽。这使我想到，当年，这两个国家的士兵相互

对阵、仇杀，而今，两国学者友好相处，同席论文。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会议闭幕的那天，我曾经当场写作并朗诵了一首小诗：

曩时对阵两相分，  
而今同席共论文。  
武战何如文战好，  
鹅湖辩难为求真。

宋朝的儒学有“理学”和“心学”之争，相互对立，形同水火。公元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理学”派的大师朱熹和“心学”派的大师陆九渊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相会，进行辩难。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唇舌，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辩论之后，友谊仍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值得提倡。

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分歧，有争论。或为意见之争，或为观念之争，或为利益、权力之争。怎么办？诉诸“武战”嘛，不好！还是要用“文战”，即讨论、辩论、协商、谈判、表决等方法为好。或服从真理，或取决多数。倘若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习惯于用这些“文战”的方法来代替“武战”，那么，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也就消灭了，和谐世界也就出现了。

应该说明的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以及其他各国的学者共同回顾、总结当年的那场战争，由于各自的背景、环境、视角不同，观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这是正常的，也是不难理解的。相信读者会以宽宏的态度对待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相信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以至“文战”会有利于对那一段历史的全面、深入的认识。

也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一项国际共同研究还正在进行中。目前新的研究课题是“战时国际关系”，已有中、日、美、英、俄等国的许多学者决定参加，有关研究成果完成后将继续结集出版。

# 目 录

|  |                    |
|--|--------------------|
| 序 一 .....                              | 傅高义 (罗敏译) / 1      |
| 序 二 .....                              | 杨天石 / 6            |
| 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 .....                   | 金以林 / 1            |
|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br>根据地的教育 .....  | 高 华 / 28           |
| 战时乡建运动：失去的机会，命运，或先驱？<br>.....          | 何福德 (宁玉兰译) / 49    |
| 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尝试：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br>.....        | 黄道炫 / 74           |
|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 .....                | 土田哲夫 / 88          |
| 官营化·教育化·普及化<br>——抗战时期后方电影的发展路径转向 ..... | 汪朝光 / 114          |
|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               | 桑 兵 / 137          |
| 沦陷时期的北京高校：可能与局限，1937~1945<br>.....     | 李斐亚 (哈艳、吴丹译) / 171 |

## 抗日战争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活动

——自由学园北京生活学校的思想与实践

..... 内田知行 (刘颖译) / 215

## 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1941~1942

..... 江 沛 / 245

抗战初期上海难民问题的处理 ..... 张建保 / 279

云南战争记忆的变异 ..... 伊香俊哉 / 295

## 战时体制下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保甲运用

(1937~1945) ..... 洪秋芬 / 308

# 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

金以林\*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决战。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战争爆发之初，提出“抗战”、“建国”并重的纲领。为适应战时环境和实现民族复兴，国民政府针对原有教育体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同广大师生共同努力，创造了中国战时教育的辉煌成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sup>①</sup>这首当年西南联大的校歌，充分抒发了教育界广大师生热爱祖国、抵御外侮的豪情壮志。

战时中国教育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同国民党在战时执行的相关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既有贡献，也有失误。本文主要针对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教育救济和党化教育的实施及其成效这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检讨，以求进一步深化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笛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扉页。

## 一 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战时教育平时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界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教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内迁大后方的教育机构如何安置，逃离侵略者魔掌的广大学生如何救济，原来相对松散的教育机构是否需要加强统治以利抗战建国的需要，这一切问题都同时摆在了执政的中国国民党面前，要求它必须迅速做出对策。

随着战火的蔓延，北平、天津和东南沿海等教育发达地区纷纷沦入侵略者之手，我国教育机构损失惨重。据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战事爆发后内迁后方复课的有77所，另有17所被迫停办；战前原有3125所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各省，战事一起，蒙受影响，停办者为数极多，导致大批青年学生失学；而受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初等教育，因为学生年龄小，无法迁移后方，多数小学都随着国土一同沦陷。<sup>①</sup>

战争爆发之初，学校正值暑假。在各级政府的协助下，众多学校纷纷内迁大后方。1937年下半年，内迁学校陆续开学复课。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全民族抵御外侮之际，原有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是否需要调整，以适应战时需要。由此，在教育界引发了一场有关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

教育界许多人鉴于“国难日亟”，认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或认为教育应“以民众为对象，以本地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或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

<sup>①</sup>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抗战书店1940年初版），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41~44页。

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sup>①</sup>

这种观点在南京失守以后，尤为高涨。当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昆明的决定刚一公布，首先就在校内教师中引起激烈辩论，争辩的焦点集中在广大师生在反侵略战争中究竟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批评内迁的人问道：生死关头在即，急需领导动员三湘民众的时候，远迁云南，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决定内迁，不啻默认继续维持战前高等教育比捍卫国家更为优先。这一争论迅速传播到学生中，学生自治会还派出代表赴汉口教育部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并得到当地报纸的支持。<sup>②</sup>

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时任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三校合组）常委之一的李蒸虽主张高等教育应予保留，但仍以内迁各大学设备损失惨重，校舍困难，影响教学为由，建议：“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sup>③</sup>

不过也有很多教育界人士反对这一主张，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对战时教育即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教育为百年大计，只应对于战时需要，作若干临时适应的措施，不应全般改弦更张，使有关百年大计的正规教育中断。<sup>④</sup>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认为：“现代战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总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总第10页。

② 查良钊：《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10日，第1页。

③ 李蒸：《抗战期间大学教育之方式》，《教育杂志》第28卷第9号，1938年9月10日，第15页。

④ 吴俊升：《战时中国教育》，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第2版，第110页。



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材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接了当改为军事学校。”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sup>①</sup>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甚至表示：“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sup>②</sup>

对于鼓励学生投笔从戎，许多人士也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无计划地使青年能尽上一士兵贡献，那无异是大学生等于中小小学生，未免浪费过多。”因为“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求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时候”。“若学生都参战，教育本身动摇”，且“无作战经验，冒失的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即令学生确能胜任，然在他人也能做时，为何一定要学生去？”<sup>③</sup>

这一争论，还曾引起两位著名军事将领的兴趣，他们分别到刚刚内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演讲，但观点截然相反。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他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虽骂得大家发愣，但同学们也不以为忤。另一位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他向学生们分析了时局，赞成学校内迁。他把大学生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的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71页。

② 《王星拱对记者的谈话》，1937年12月5日《大公报》第3版。

③ 吴景宏：《战时高等教育问题论战的总检讨》，《教育杂志》第30卷第1号，1940年1月10日，第7页。